

第一章

仙逝的**1**擎

坚持真理的楷模——

马寅初 (1882~1982)

他是我国第一个到国外学习经济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他从教六十余载，桃李满天下。时至今日，北大出身的他的弟子、再传弟子们提及他时，没有人直呼其名，而是尊称其为“我们校长”。1982年，他走入了另一个世界，这位百岁老人，见证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沧桑。

抗战时在重庆，他曾当众质问孔祥熙，指斥他们发国难财，还骂蒋介石“不是民族英雄，是家族英雄”，因而被蒋监禁了两年。新中国成立后，他衷心拥护共产党，但对问题有他自己的独立见解，决不盲从。当年学苏联，大学不搞科研，他执掌北大期间，主张高等院校也应当从事科学研究。五十年代他便提出了控制人口的理论——《新人口论》主张“提高人口质量 控制人口数量，”否则，“势必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他认为国家应采取措施，奖励节育，用征税办法限制生育。可是，他的正确的主张，反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是“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翻版。面对随之而来铺天盖地的“批判”，他坚持真理、威武不屈。周恩来总理曾劝他作个检讨，以便过关。他严肃地说，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我决不在压力下屈服。我虽年届八十，明知寡不敌众，我也要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在历次检讨运

动中，都低下了他们本应高贵的头颅，都弯下了他们本应不屈的双膝，而他却有威武不屈的铮铮铁骨，有傲雪凌霜的无畏精神。知识分子以其良知对真理的捍卫莫过于此……他终于被迫辞去北大校长一职，并被免除人大常委的职务。历史证明了他的正确，然而可惜的是，历史给他的平反来得太晚了。当平反的通知到达时，这位年近百岁的老人，坐在轮椅上，对于崇高的赞扬除了木然的表情，脸上已经没有什么鲜明的生命的痕迹。

他是当之无愧的经济学家、教育家、民主斗士。他叫马寅初，记住：这绝对是一个值得所有人都肃然起敬的名字。

马寅初传略

马寅初，原名元善，字寅初。1882年6月24日出生在浙江省绍兴一个开酒作坊的家庭。他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家。

1906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后赴美留学，先后在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获博士学位。1916年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历任经济系教授、系主任、教务长等职，“五四”运动期间热情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在此期间，还兼任浙江兴业银行顾问、中国银行总司卷、中国经济学社社长等职。1920年与上海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合办东南大学商学院。1927年后，历任中央大学、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苏州东吴大学、浙江大学等校教授，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抗战期间，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反对独裁统治，面对反动统治势力，不畏强暴，挺身抗争，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投入息峰、上饶集中营。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重庆大学、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上海工商专科学校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华东行政委员会副

主席，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名誉校长，中国银行常务董事等职。

早在 50 年代初，他就注意并开始研究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实际问题。在著名的《新人口论》中，他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他提出了“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认为 1953 年～1957 年，中国人口很可能已超过 1953 年人口普查得出的年增殖率为 20‰的结果。如果按 1953 年统计的 20‰的增殖率估算；三十年后同实际的人口数字一比，就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了”。他还分别从加速积累资金、提高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以及增加工业原料等方面，对控制人口的必要性、迫切性进行了论述。他尖锐地指出，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愈加棘手，愈难解决。政府对人口若再不设法控制，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他提出了定期举行人口普查，把人口增长纳入第二个、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议。1957 年因发表《新人口论》等文章而遭到错误批判，1979 年党中央批准了北京大学党委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

马寅初教授毕生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稳定物价、控制人口等重大问题献计献策，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科学、人口科学学科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主要著作有《通货新论》（1944）、《战时经济论文集》（1945）、《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1958）、《中国外汇论》（1925）、《中国银行论》（1929）、《中国关税问题》（1930）、《资本主义发展史》（1934）、《中国经济改造》（1935）、《经济学概论》（1943）、《新人口论重版》（1979）、《马寅初经济论文集上下》（1981）等。

近看马寅初

建国初期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的马寅初，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身体出奇的棒。当时他年已古稀，虽然鹤发稀疏，却有红润的童颜。他仍常常在假日到西山去爬山，还常年坚持洗冷水澡，在北京冬天那寒风刺骨的河岸上，老人家光着身子就往冷水里跳。

马老给人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说话挺怪。不管是请什么政治权威人物作报告，他的开场白都是自称“兄弟”。有一次在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报告会上，开始之前，他先不是按常例称赞李富春，而是先说：“今天高教部请客，兄弟我吃了几杯老酒。”当时，自称“兄弟”的，在电影中、话剧里，大抵是黑社会分子，或者是国民党反动军官。他对于李富春既不尊称为李副总理，也不平等地称他为同志，而是称他为“李先生”。李富春开始讲话以后，他忽然搬了一张椅子，在靠近讲台的地方泰然自若地坐了下来，因为他的耳朵不大好。当时的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位老人个性鲜明而且好玩。

关于马老的轶事还有很多，比如有一则笑话说：马寅初讲课很少翻课本、读讲义，讲得激动时，往往走下讲台，挥动胳膊，言词密集，一些坐在前排的学生说：“听马先生上课，要撑雨伞”；比如前文提到的他怒斥孔祥熙、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马先生的很多事迹，如今都已成不朽的传奇，下面就带读者朋友们走近大师，让您认识一个有血有肉的马寅初。

不求学，毋宁死

1882年6月，马寅初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以酿酒为业的小作坊主家庭。他出生后不久，父亲为寻求更好的酿酒水质，将全家移居地处黄泽江和剡江会合处的嵊县浦口镇。马寅初就在这乡风淳朴、风景秀美的小镇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

前店后坊的马家，生意越做越红火。父亲见五个儿子中，排行老五的寅初最为聪明伶俐，有心让他继承父业，想先让他学会酒店管账、再承家业。因此，父亲只让马寅初读私塾，无意让他继续求学。马寅初不喜欢私塾的四书五经，向往城里的新学堂，他见父亲强让他学酒店管账，非常不满。常常以怠学、怠工以示反抗，为此，多次遭到父亲打骂。

有一次，父亲郑重地与他谈话：“你也不小了，应该学会酒店管账以后……”不，我要到城里读书。”未待父亲讲完，马寅初抢先表示了自己的态度。“我不会让你外出读书！”父亲显然生气了。

“我就是要到城里读书！”马寅初也不示弱。“你给我跪下！”父亲大声吼着；“就是跪，我也到城里读书！”马寅初的执拗使他饱受皮肉之苦。父亲的蛮横，深深伤害了马寅初，他见求学无望，一气之下跑到镇外，一头扎进了黄泽江，幸亏被人救起。

马寅初为求学而以死抗争，虽险遭不测，竟也由此因祸得福。原来，恰在此时，父亲的老友张江声由沪来嵊县探亲访友。得知此事，觉得马家老五有志气，说服了马寅初的父亲，由他带马寅初到上海读书。从此竟改变了马寅初的一生。

1898年，17岁的马寅初在张江声的安排下进了上海教会学校育美书馆读中学。强烈的求知欲和勤奋刻苦，使他学习成绩始终名列班上前茅。1902年，马寅初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天津北洋大学。天津北洋大学是一所专门教授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培养中国高级工程人才的学校。学校要求非常严格，每年都有不少学生遭淘汰。马寅初由于在中学期间打下了扎实的数学、英语基础，在班上成绩仍是遥遥领先。

1907年，马寅初以优异成绩从北洋大学毕业，并被北洋政府保送至美国耶鲁大学官费留学。在耶鲁大学，马寅初选择经济学作为专攻方向。1910年，他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继而又考取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生。32岁那年，马寅初获得哥伦

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

1916年，马寅初拒绝了导师的盛情挽留，回到了祖国。不久，北大校长蔡元培邀请他担任北大经济学教授，从此马寅初开始了他的从教生涯。

怒斥孔祥熙

在美国学成归国后，马寅初先生先后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的秘书长，对于当时财经法案的审议，无论在大会上和审查会上，都是站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力陈利害得失，据理力争，不管当时的财政部长是宋子文还是孔祥熙，他都不为这些炙手可热的权贵力量所屈服。

每当财政部提出增税、发行公债等有关增加人民负担的法案和修订关税等有损于国家主权和利益的法案时，马先生总是大声疾呼，坚决主张不予通过。即使孔祥熙、宋子文亲自出席立法院会议，强做种种说明和辩解，他仍是坚持做面对面的斗争。因此，孔祥熙、宋子文对马老先生是畏之如虎，恨之入骨。

1939年春到1940年12月，马寅初在重庆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他致力于办好商学院，并着重研究中国抗战时期的经济问题。

1939年秋，马寅初借重庆道门口银行公会场址，召开1939年中国经济学社年会。事前马老特亲邀财政部长孔祥熙参加。

大会开始后，马老致开幕词，说明学社汇集了财经专家，人才济济，应负起责任，和财政当局共商对策，以解救当前财政经济的危机。社员鼓掌赞同后，马老接着说：“今开我们很幸运，我们的社员，现任财政部部长的孔祥熙先生，在百忙之中参加这次年会，孔先生是财政经济专家，又是掌握全国财政命脉的最高主管长官，现在我想先请孔部长对国家当前的财经情况和政策，给我们作一指导。”

孔祥熙根本没有想到马老先生将他一军，被弄得面红耳赤。但

在大家热烈鼓掌并都把眼睛盯着他的情况下，他只得走上台去，敷衍一阵。

马老先生在孔祥熙发言将毕时说：“请问部长先生，在法币已经贬值，物价不断上涨的时候，财政当局没有设法稳定币值，制止物价上涨，反而突然宣布大幅度地降低法币对美元的比价，推波助澜地造成财政上的大紊乱，使物价更猛烈地上涨，我们学识浅薄，不知用意何在？”

马寅初先生接着说：“听说这次调整美元比价公布以前，那些洞悉内情的人，都拼命地向市场上抢购美钞、黄金、白银，还通过种种方法套购外汇，抢购物资，不顾人民死活，一夕之间都发了大财。请问部长先生这又作何解释？”

当时到会的社员，虽然感觉到马老先生的发言会触怒孔祥熙，但又对他的不畏权势，敢于说出大家的心里话而由衷地敬佩，会场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致使孔祥熙在台上呆若木鸡，无言以对，下不了台。

这时，有人提议休息 10 分钟，这才解了孔祥熙的难堪之围。接着这位孔部长就乘此机会，托言有事，溜之大吉，但他心中对马寅初先生无情的揭露，恨之入骨。

1940 年，马寅初先生又召开了 1940 年中国经济学年会。年会在重庆大礼堂举行，重庆、广州、桂林、昆明的社员均参加了这次会议。大会仍就当时政府的财政措施，加以批判。当时财政部部长孔祥熙，虽然是中国经济学社的永久社员，但鉴于 1939 年年会所受的窘迫，不敢参加了。但是出席大会的社员依附孔宋的也大有人在，因此，马先生对当时财政当局的指责和批判，也传到孔祥熙的耳中。为此，宋霭龄、宋美龄不得不向蒋介石施加影响，要求对马寅初进行严厉处置。

蒋介石于是通知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来见他。一见面，蒋介石就怒气冲冲地说：“你真糊涂！你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的话全是无稽之谈！”又说：

“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

蒋介石表示要与马寅初谈谈，孔祥熙甚至也想请马寅初出任财政部长，以资拉拢，但是都遭到了马寅初的拒绝。

1940年1月24日，马寅初在重庆大学作题为《我们要发国难财的人拿出钱来收回膨胀的货币》的讲演，他公然说：“前些日子，蒋委员长要我去见他，他为什么不来见我呢？在南京的时候，我教过他的书，难道学生就见不得老师吗？他就是不敢来见我，就是害怕我的主张。有人说，他是‘民族英雄’，我看他只能算是个家族英雄，因为他庇护的只是他的亲戚家族。他们用租税、公债和通货膨胀三种办法，刮尽了天下的民脂民膏，甚至连他们子子孙孙的棺材钱都捞足了 哪里还管老百姓的死活！”

向四大家族开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马寅初以经济学家的身份，观察和研究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在对四大家族和国民党财政金融界的种种内幕的剖析中，马寅初发现，中国当时的经济不仅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遭到严重破坏，更为糟糕的是，统治集团中的豪门权贵在民族危亡的关头，非但不与人民共赴国难，反而趁机浑水摸鱼，大发国难财。他把这种情况形象地概括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浴血抗战，后方平和满贯。”为此，他提出了要向四大家族征收战时财产税的主张，受到广大劳动民众和爱国学生的拥护和支持。在那段日子里，马寅初在各种集会上发表演说，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嘴脸。他的话清澈如水，炽烈如火，燃烧着每一位具有爱国意识的中国人的心。他曾说，“言人之言者易；言人之所欲言者难；而言人之所不能言者，就更难了！”马寅初在黑暗的国统区里，以他的地位、知识和胆略，为民请命，仗义执言，说出了广大人民欲言而不能言的话，使国民党统治阶层坐卧不宁，如骨鲠在喉。于是他们采取了种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对马寅初进行收买、利诱和恫吓。然而，正义的脊梁是压不弯的，真理的传播是封不住的。

1940年冬天的一个下午，重庆大学礼堂内人山人海，连窗外和过道里都挤满了人，原来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教授在作《论战时筹款的三大办法》的演讲。他以大量确凿无疑的证据和精辟入理的剖析，再一次揭露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倒行逆施。他还愤怒地说：“前些日子有人竟写匿名信来威胁我，说不听招呼是要吃‘卫生球’的，如果再演讲攻击政府，将以手枪对待云云。今天我正式发表声明，本人难以从命，现在又演讲了。”今天我特地把我的妻子儿女都带来了，让他们都来听我的演讲，让他们知道我的主张究竟是什么。如果我惨遭毒手，今天的演讲算我最后留给他们的遗嘱……我马寅初根本不怕死，如果怕死就不会来这里……”长达3个多小时的演讲，激起了在场听众一阵又一阵的雷鸣般的掌声。他的声音代表了人民的心声，使在场的宪兵特务目瞪口呆。

四大家族为了铲除异己，压制舆论，以达到他们为所欲为的目的，于1941年以最卑鄙的手段指派特务到重庆大学商学院劫持马寅初先生，并将他送到贵州息烽软禁起来，一时群情哗然。当时，特务到了商学院，声称请马先生开会，同学们见了，觉得情况有异，纷纷出来阻止马先生上车，并和特务力争，但是，马先生深恐同学们激于义愤而酿成事端，力劝同学们冷静，并说：“同学们放心，看他们岂奈我何！”

这样，马寅初先生失去了自由。直到1942年8月，国民党政府迫于中国共产党、爱国民主人士和重庆大学学生的压力，不得不将马老释放回重庆大学商学院上课。他仍然利用讲台，抨击国民党政府的黑暗腐败。

拒绝检讨，匹马应战

建国后，马寅初以警醒的态度审视着和平发展时期的人口问题。他将人口问题列入自己科研计划的重点项目，矢志不渝地展开攻关，并身体力行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使国家对人口问题心中有数，更好地解决生产、生活

两大难题，他积极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开展人口普查。党和政府采纳了他的提议，在 1953 年上半年实施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同年 11 月 1 日得出了普查结果：截至 1953 年 6 月 1 日午夜 我国人口为 6 亿。仅仅 4 年时间，全国就增加了 1 亿多人口。这个数字让把国家前途和命运系于己身的马寅初感到震惊和不安。

1957 年 6 月，马寅初将写成的《新人口论》一文作为提案，提交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讨论。文中，马寅初分析了人口迅速增长同粮食增产、就业压力、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之间的矛盾，提出了人口增长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并在量上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从而明确提出了要积极发展生产，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观点。

《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全文刊载了《新人口论》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此举，令对人口问题研究锲而不舍的马老先生倍受鼓舞。可是，马寅初想错了，高兴早了。事态的发展对善良的马寅初来说，是料想不到的。这时的毛泽东认为马寅初的人口论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将他连同他的《新人口论》打入了冷宫。就连过去几年赞成马寅初的观点、对人口问题表现出关注的其他领导同志也起而批驳。马寅初的厄运也就随之而来。一个批判“马寅初反动思想”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据现在档案资料统计，仅 1958 年下半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等全国重要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就达 200 多篇。

马寅初生性不唯上、不惧压，他公开表露，“为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斗，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

1959 年夏天，马寅初随人大视察团赴外地视察回到北京。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党中央找他谈话。因为马老不服输，认准了理，谈话自然是谈不拢。马老在友人和真理面前，选择了真理。他对周总理说：“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

不是我马寅初！”

后来，马寅初写了《重述我的请求》一文，严正声明：“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所投降！”

这以后对他的批判就升级为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了。一夜之间，上万张大字报贴满了北大校园，甚至连他家的院子里、书房里及卧室里，都贴满了大字报。“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在北大校园内此起彼伏。1960年1月3日，马寅初被迫向教育部提出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不久，他又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还被规定不得发表文章，不得公开发表讲话，不得接受新闻记者访问，不得会见外国人士和海外亲友。以戴罪之身，遭受软禁。从此，马寅初消失在新中国的学术论坛和政治舞台上。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个夏天，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在认真审阅有关马寅初的材料后，动情地说：“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马寅初先生得到了彻底平反，党中央肯定了《新人口论》和综合平衡经济理论的正确性，恢复了他的职务和名誉。马寅初生前很喜欢一句诗，这句诗也正是他伟大正直一生的真实写照：“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不朽的篇章——《新人口论》

在《新人口论》中，马老深刻地论述了我国当前存在严重的人口问题，以及它的性质、表现形式和解决途径。《新人口论》着重回答了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1. 中国当前有没有人口问题

马寅初先生第一个指出我国的确存在严重的人口问题。他写

道：“我国人口太多，本来有限的国民收入，被六亿多人口吃掉了一大半，以致影响积累，影响工业化。因此，中国人口如继续这样无限制发展下去，就一定要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

2. 人口的迅速增长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存在严重的矛盾

人口增长过快同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不相适应，表现为人口增殖太快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种种矛盾。马老写道：“我们过多的人口就拖住了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

3. 控制我国人口的过快增长是十分迫切的问题

马老严肃地指出：“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我的意思是政府对人口问题若不再设法控制……难免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

4. 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根本途径

马老对于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提出了他的新思路。

(1) 积极发展生产

这是根本的、必要的。他认为：“人口与生产的关系比任何其他因素都重要。”必须努力发展生产，才能缓解人口与经济的种种矛盾。但是，仅仅靠发展生产还不够。

(2) 控制人口数量

他认为，除了积极发展生产还必须大力控制人口数量。他对控制人口数量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比如，实行定期的人口普查、实行计划生育、加强对控制人口重要性的宣传、提倡晚恋爱、晚结婚、晚生育、运用经济手段推行计划生育、运用行政力量作为辅助手段来控制人口、采取避孕的办法来降低人口的出生率等。

(3) 提高人口质量

我国不仅人口数量多，而且人口质量低。马寅初主张大力提高人口质量，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和知识水平。只有这样才能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才能有生产力的高速度增长，才能使国家富强起来、人民富裕起来。

5. 着重批判马尔萨斯的反动的人口理论

在《新人口论》中，马寅初指出：“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他还论证了马尔萨斯的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的理论都是错误的。马尔萨斯的用战争、瘟疫等手段来抑制人口增长的理论更是反动的。

当年，北大经济系教师当中，赞成马老新人口论观点的确有人在。1958年初，陈岱孙、樊弘、赵靖等教授组织了一个人口理论研究会，其中陈岱孙教授、赵靖教授等都是赞同马老的观点的。政治系的许德珩教授也说过：“当时，我是非常赞同马老‘人口论’的。”但是，自从批判新人口论以来，北大并没有像别的政治运动那样揪出一个集团，连马老的写作助手也没有受到批判。这主要是由于马老将一切责任完全独自包了下来，没有牵连别人。

从教七十载，桃李满天下的 学界泰斗——

陈岱孙 (1900~1997)

1997年7月27日，中国经济学一代宗师陈岱孙教授逝世，享年97岁。

一尊半身铜像，伫立在黑色的大理石台座上，黑色的大理石台座伫立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人来人往的大厅里。2000年4月清华校庆日，新老清华学人在此举行“陈岱孙先生铜像揭幕仪式”，红绸起处，一位面目清俊的肃然学者便成为这煌煌学府一个恒定的存在。清华人说，早在20世纪20年代，陈岱老便成为清华大学经济学科的创始人，他70年的教学生涯是从这里起步的……

一位扶杖老人，在燕南园的松风花影中冥坐，松风花影的燕南园是北京大学名师宿儒的汇聚之地。1998年5月4日北大百年校庆，一批又一批海内外学子走进燕南园，向这尊面带微笑的蔼然长者的铜像鞠躬致敬。北大人说，陈岱老在北大45年，育人无数，他97载生命岁月是在这里结束的。

如今的北大经济学教授，在解释“经济”这一概念时，大都用“经济者，经世济民也”。这个精美的定义就源于学贯中西的陈先生之口。他的座右铭是“关心社会，以国事为重；关心别人，以他人利益为重”。1926年，陈岱孙在哈佛获经济学博士时，年仅26岁，

回国后任教于清华大学经济系。1928年，受聘任系主任；翌年兼任法学院院长；1945年，任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企图说服他去南京，还有人劝他去美国都被拒绝了，他选择留下来，迎接北平解放。

陈岱孙先生讲课极为认真，内容丰富，言简意赅，深受同学欢迎。他总以求真求实为准绳，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待人真诚宽厚，诲人不倦，从不以权威自居。而他自己则活到老、学到老，永无自满和停息之日，以至他自谓：老之将至而不知，知后还有“挣扎着不服老”。这是他坚韧不拔地追求真理和完善自我精神的生动写照。他的风度和魅力，令一代又一代学子称道并引为楷模。陈岱老业绩非凡，教学成绩突出，是国家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

他80岁以后仍坚持上台给本科生讲课，年逾九旬还亲自带研究生，整整执教70年，为国家培养了无数人才。朱镕基总理曾在陈岱老95大寿之际，持学生之礼贺寿：“先生年高德昭，学贯中西，授业育人，68年如一日，一代宗师堪称桃李满天下。惟愿先生健康长寿，松柏常青，学生有幸，幸何如之。”

陈先生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时代风云，面对了太多太多的死亡，他称得上是历尽沧桑。他们是那一代学人中最后一个走的。他的仙逝，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代学人的终结，但是，他们的精神、风范、操守、才智，将永恒。

陈岱孙传略

陈岱孙先生是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家，北京大学教授。原名陈总，1900年10月20日生于福建省闽侯县。1915年考入福州鹤龄中学。1918年考入清华大学，1920年毕业后取得庚子赔款公费留美资格。1922年6月取得威斯康星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并获金钥匙奖。同年9月入哈佛大学，1924年6月被授予文学硕士学位，